

風雨五十年

周純麟

貴州人民出版社





《风雨五十年》

周纯麟

贵州人民出版社

文字整理 陈识金
责任编辑 戴美莹
封面设计 邹 刚

风 雨 五 十 年

周 纯 麟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00千字 插页1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 7-221-00274-5

I.70 定价 2.24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西行转战	(4)
越过平汉路 漫川关突围 子午镇宿营	
进军川北 通南巴反“围剿” 夜袭狮姑顶	
第二章 新疆戍边	(36)
惨败星星峡 “新兵营”学习 赴友军工作	
狱中斗争 野营前后 回延安 重返新疆	
第三章 铁骑纵横	(143)
岔河集创建骑兵团 界头集表演马术 泗灵	
睢连战皆捷 洪泽湖边割草运盐 打开西进	
的大门 八里庄活捉李光明 涡阳追歼顽骑	
八师 李二圩击毙潘汉楼 铁骑送长征	
第四章 建设现代化炮兵	(200)
参加组建炮兵 军事学院学习 送战友炮击	
金门 向文化技术进军 领导干部的思想建	
设 在最关键的地方下功夫 培养部队的群	
体作战意识 入越对空作战	
第五章 在上海警备区	(245)
试试看的书记 抓王维国、陈励耘 周	
总理的深情 张春桥的闷棍 “两常会”的	

斗争 被软禁在医院 架空了的司令 顶
住“刹回潮风” 反对“重建”民兵 参加
中央打招呼会

后 记

引 言

我是一九一三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出生的，老家在湖北省皮安南县桃园区周家湾村（即现在的湖北省麻城市宋埠区大塘乡）。

我们麻城，位于湖北省的东北部，大别山主脉的西南，是个山色秀丽的地方。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军阀连年混战，老百姓饱受兵燹之苦；更加上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火打劫，横征暴敛，麻城人民更是无以聊生。

我们一家，也与麻城县成千上万个佃户家庭一样，在死亡线上煎熬。我的祖辈，世代帮工种田。我的父辈，兄弟四人，只有一亩多田，主要靠租田种和到地主家帮工。

我的父亲，名叫周承续。他眼看租种地主家的田地，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到地主家帮工。但是，全家仍然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断顿无粮。我兄弟姐妹七个，由于家境困苦，我的大哥、二哥、二姐、三姐，有的刚生下地来、有的活到一、二岁，最多的是大哥活到九岁，就都相继死去了。一九二五年，即我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在地主家帮工时，长了个搭背疮。由于没钱医治，烂得很厉害，地主就把他解雇了。没多久，我父亲就活活地被饥饿和疮患夺去了生命。父亲的病故，对我们家来说，是倒了一根大梁。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我三哥除了种地，还磨豆腐、榨油、挑货

郎担、扛布捆子卖和扎纸扎。我也悄悄地跟着他学习扎纸扎，学习磨豆腐，学习榨油，学习挑货郎担。慢慢地，我也就成了他的一个帮手。他扎纸扎，我就帮着贴；他榨油，我就赶牛推碾；他扛布捆子，我就摇货郎鼓；他做豆腐，我就推磨、烧火。因此，乡亲们也都亲切地称呼我“小纸扎匠”。

这时候，我们家乡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活动。最初传播革命思想的是在武汉读书的一些进步青年，他们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深入工农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发展了一些先进的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入党。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及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在九月间传达到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黄麻人民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的胜利，亦给当地党组织和广大人民极大的鼓舞。两县党组织迅速制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计划，积极领导广大群众集会、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不分昼夜地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形成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十月间，湖北省委鉴于黄麻两县当时尚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和很好的群众运动基础，遂派王志仁、吴光浩等同志到黄麻地区，建立了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等县的武装起义。特委要求黄麻两县党组织更加广泛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农民自卫军和加强群众武装，继续发动起义，并于十一月初在七里坪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武装夺取黄安县

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

十一月十三日，声势浩大的起义壮举开始了。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以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悍农民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于当天夜里十时浩浩荡荡向黄安县城进发。七里、紫云、高桥、二程、桃花、城关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响应，配合作战。十四日四时，攻城部队在城内人民配合下，一举攻入城内，全部消灭了反动警察武装，摧毁了反动县政府，活捉了伪县长贺守忠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数十人，把土地革命的红旗胜利地插上了黄安城头。十八日，黄安城内举行了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举行了隆重的检阅仪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

黄麻起义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湖北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的一次著名起义，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壮举，它极大地鼓舞了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革命的方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

黄麻起义的胜利，也唤醒了我这颗贫苦少年的心。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我先后参加了少先队、区赤卫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自愿报名参加红军。从此，我便在党和军队的关怀教育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第一章

西行转战

一、越过平汉路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和第十五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是一月下旬从红军补充团调到正规部队的。因此，我当红军的第一个连队，就是刚刚合编的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七连。

一九三一年秋，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

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了。我为自己能参加这个成立大会而感到自豪。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大会是在黄安县七里坪镇召开的。会上，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宣布，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任政治委员。

方面军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兵力近三万人。原四军所辖的十师、十一师和十二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我仍在十一师三十三团七连四班当副班长。我们十一师的师长是王树声同志，政委是甘济时同志。

此时，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虽未开始，但已重兵云集，呈箭在弦上之势。方面军总部一直密切注视着敌人的部署变动和增兵活动，并积极开展外线进攻。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的八个月时间里，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

但是，蒋介石灭我之心有增无减，他在第三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便又重新组织力量，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企图在短期内扑灭红军。他是三步棋：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极其险恶。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

这时，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是，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盲目轻敌，执意令部队南下作战，没有及早进行反“围剿”准备，使我军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动权，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结果，第四次反“围剿”，从八月上旬开始到十月中旬为止，我军苦战两月，虽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

十月十日晚，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同志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事后看来，黄柴畈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南、北三面都去不得，只有平汉路以西的少堡垒地带，是我军较理想的转移方向。那带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不难突破；地势有利，可借桐柏山、大洪山作依托，又是红三军活动的地方，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从各方面条件来看，都便于我军周转回旋，待机破敌。

谁知，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不仅敌人变，我们的情况也在变。我们本想到豫家湾红三军活动的地区，休整一下部队再杀回马枪。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到了那里一看，红三军已经走了！政权、根据地已不存在，只留下一片断垣残壁。我们到枣阳新集，正是早晨。刚住到一个圩子里，搞饭吃，胡宗南的部队就赶到了，向我们打炮。这一仗，打得很艰苦，部队伤亡很大。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同志牺牲了。倪师长要我和曾玉良同志送信到三十二团时，发现三十二团团长林维权同志已经身负重伤，这个团的通信员也大部分负伤或者牺牲了。怎么办？我俩经过合计，决定把林团长背回师部。

我们俩不断地替换着，一会儿他背，我掩护，一会儿我背，他掩护，但是，由于林团长失血过多，伤势过重，半路上就牺牲了。曾玉良因为途中突然遭到敌人火力射击，被敌人一发子弹打中手背，负了伤。

这样一来，我们在根据地外边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计划，就没法实现了。敌人大军紧跟着我们，回也回不去，只有往西走。

这时候，李先念同志已是我们的师政委了。记得一天下午，我到团里送信刚到师部，通信员姚运良同志对我说：

“副班长，我们师来了一位新政委！”

“是谁呀？”我关切地问。

“你进去瞧瞧就知道了！”姚运良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师部的临时指挥所。

我们师部通信队，是在打了冯寿二、七里坪等战斗之后扩大的，一共有二个排六个班。一排三个班是手提枪，老百姓叫“花机关”，主要是在师部门口担任执勤、放哨的任务，有时也送信；二排三个班挂的是匣子枪，主要是跟随师首长下部队和担任送任务，我当时在二排五班当副班长。

平时，师首长在师司令部研究重大问题时，虽然不回避我们，但是，我们通信员一般是不往前凑的。今天，一方面我要向倪志亮师长汇报送信情况，更主要的是想瞧瞧新来的师政委，我整了整军装，推门进了屋。

屋里有两个人：一位是我们的倪师长，一位是原三十三团的李先念政委。我向倪师长汇报送信情况时，目光不时地望着李政委。

倪师长好象看出我的心思，兴奋地对我介绍说：“小鬼，认识吗？他就是我们师的新政委！”我赶忙向李政委敬了个礼，李政委也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姓名和家庭情况，倪师长也介绍说：“他是通信队五班副班长，人很聪明，打仗也很勇敢！”

自从李政委来了以后，我们通信员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学习上，变化更大。李政委待人和蔼可亲，我们通信员都喜欢跟着他下团。那时战斗频繁，工作忙，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进步。

有一次，李政委下团给干部作报告，在回师部的路上，他问我：“小周，今天我讲了些什么？有没有讲得不好的地方？”

他这一问，把我问傻了。我好半天没有答上话来。过去跟师首长下营团，首长一开会，或者一作报告，我们通信员就找团里通信员或战士们玩去了，师首长回来，我们也就跟在后面回来。今天，也象往常一样，李政委一作报告，我就悄悄找团部通信员去了。李政委这一问，把我急得不知说啥好。

李政委看我着急的样子，就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一边走，一边与我谈要学习的道理。他说：“通信员不是首长的‘尾巴’，应该是一名懂政治、懂军事、懂保卫职责和能够体察首长情绪意图的优秀战士！”他还说，战场上的情况是随时变化的，通信员、特别是通信班长和副班长，要能随时体察首长的思想情绪和意图，为首长的着急而着急，为首长的忧虑而忧虑。譬如送信，信封上有一个“十”怎么走，有两个“十”怎么走，有三个“十”怎么走，这信封上的“十”字表示战事的急与缓。再比如，送口信，除了正确以外，还要注意首长面孔、眼色，因为你们经常直接跟全师团长、政委们接触，师、团首长的心情，特别在战场上，情况的急和缓往往可以从面孔、眼色上表现出来。你们要善于体察，但不可添油加醋，不可随便说这是首长说的，那是首长讲的，一定

要准确无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了解党和军队的大事，了解战场上变化着的情况，不要把宝贵的间时白白浪费掉。

我们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听了李政委的这一席话，我的心更是起伏不定。他的这些话，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新鲜，又是那样的语重心长。从此，我和班里的同志再跟师首长下部队，除了比较注意多接受首长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外，还抓紧空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打枣阳新集期间，李政委与我们一道同甘共苦，两天两夜没有吃一点东西。一天下午，在一个地坎下阻击敌人，我们找到了一些山芋送给李政委。李政委首先问我们吃了没有，直到我们每个同志都回答“吃过了”，他才拿起一个小山芋，在草上搓了搓，吃了起来。

那时候，天天都要行军、打仗，白天没空，一到晚上，就要忙着准备干粮——把大米煮成饭，然后再炒，做起来比较费时、费事。有段时间，姚运良打“摆子”，发高烧，行军时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一天行军下来，躺倒之后，他早已累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想爬也爬不起来。于是，我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干粮，先给他做好一份，再做自己的那一份。从过京汉线开始，他吃的干粮，几乎天天都是我给他准备的。

除了吃的，还有穿的。衣服都不讲究，好穿都行。可是，草鞋就不行了，在长途行军中，鞋费得很厉害，每到一地，就要搞些破布打草鞋。到了陕南商州一带，有时一天要过七十二道河。

所谓一天过七十二道河，其实，过来过去还是在一道弯

弯曲曲的河道里。主要是因为路不好走，拣干的或水浅的地方走。所以，每天在河道里，来回地穿来走去，名义上说过七十二道河，实际上，一天并不止过七十二次河。由于过河次数多，许多同志的脚都被水泡烂了。姚运良的脚烂得更厉害，青一块，紫一块，烂得草鞋都没法穿。于是，他就赤着脚，跟着部队走，渐渐地脚就裂开一个一个大口子，就象老树皮一样。我看着实在心痛，就把自己两年多没有舍得穿的鞋子送给他穿。

这双鞋，是我母亲做好后，让叔叔送到部队给我的。叔叔一共给我送来两双鞋，我穿了一双，这一双想留作纪念，舍不得穿。有一段时间，我的脚也烂了，裂了很大的口子，痛得不得了，几次拿出这双鞋子，想穿在脚上。但是，一想到家里的母亲，想到古书上岳飞母亲为岳飞刺字的故事，就怎么也舍不得穿了，总想把它留在身边，作为对母亲的思念，作为母亲支持自己革命到底的纪念。

姚运良同志知道我这双鞋的来历，知道我对我母亲的深厚感情，和我留着这双鞋作纪念的意义，起先，怎么也不肯收我这双鞋。无奈，他扭不过我的真诚心意，在我的劝说和“逼迫”下，才终于穿上了这双鞋。

可是，姚运良的脚烂得太厉害，穿上新鞋仍然疼痛。怎么办？我从小包袱里拿出一件旧衬衣，一撕三块，一块给姚运良包脚，一块给曾玉良垫草鞋，一块我自己留用。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总是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通过一件一件具体实在的事情，慢慢建立起来并逐步加深、升华的。

一天上午，师首长要我送一封信到方面军总部去。当时，方面军总部住在商州东北郊的一个庄子上，离我们师部

驻地比较近。

我走进一个地主家的瓦房院子时，一眼就看见徐向前总指挥正在走廊底下打草鞋。起先，我站在他旁边，没有吭声。我望着他打草鞋那熟练的动作，心中不由得一阵惊叹，对徐总指挥的敬仰之心，也油然而生。

正当我呆头沉思的时候，忽然，徐总指挥抬起头来，问我：“小周，来干什么？”

“送信！”我慌忙地回答，并将信递给徐总指挥。

徐总指挥一边看信，一边问我：“会打草鞋吗？”

“打是能打，不过打得不好。”我回答说。

“通信员不会打草鞋，就不能完成任务。”徐总指挥非常诚挚地对我说，“为什么呢？因为通信员跑的路，要比别人的多，宿营之后还要送信。你们如果自己没有草鞋，就不能走长路。你们通信员身上，至少要背一、两双草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草鞋。我们马上还要走好多路，过好几道水。”

停了一会，徐总指挥又说：“草鞋要打得既快又好。开始打不好也没关系，可以学，但一定要学会打！这是打好仗的必要准备。我们现在住在商州，要注意搞些能打草鞋的布条。同时，树皮、葛藤以及玉米皮，都可以打草鞋。”

我低头望了一下，看见徐总指挥打的草鞋，用的是布条。他见我望他打的草鞋，就用左手勒了一下布条，说：“这种六条筋的草鞋难打一些，你们可以先打四条筋的。”

接着，他教给我许多打草鞋的办法。譬如，怎么起头，怎么收尾，中间怎么放松，两边怎么打，打四条筋的草鞋与打六条筋的草鞋有什么不同等。我一边听，一边动手学着打。

返回师部的路上，我想着刚才徐总指挥亲自打草鞋的情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觉得：我们的徐总指挥，不仅深谋远虑、决胜千里，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而且在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上，也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不久，我们就一路向西，昼夜行进，走了十天，经过新野、邓县、南北塘等地，来到了漫川关。

二、漫川关突围

当我们的部队进到漫川关的时候，杨虎城的部队已经守住关口，胡宗南、肖之楚、刘茂恩的部队也涌了上来，对我军形成了包围的局面。

漫川关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地形十分险要。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黄昏，我们赶到了漫川关以东的任岭地区。起先，胡宗南的部队并没有弄清我们是什么部队，还吹号同我们联系。如果这时趁敌人立脚未稳、情况不明，一个冲锋打下去，有可能把敌人击溃。但由于十师师长指挥不力，贻误了战机，使部队处于被包围的劣势。同时，十多天来，部队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已经十分疲惫。因此，红四方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一个河沟中行军。突然，听到前面机枪打得激烈。倪师长便命令三十一团，立即占领右边的山头 and 河沟的右岸。同时，倪师长和李政委派我送一封急信去总部。

这次行动，红四方面军总部是跟着十二师走的。我翻了